

〔意〕 I·西龙尼著 马祖毅译

苦习录



〔意〕 I·西 龙 尼 著
马 祖 毅 译

芳 丹 玛 拉

湖 南 人 民 出 版 社

1980·长沙

芳 丹 玛 拉

〔意〕I·西龙尼 著

马 祖 毅 译

责任编辑：唐荫荪

装帧设计：许康明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衡阳印刷厂印刷

*

1981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120,000 印张：5.75 印数：1—51,000

统一书号：10109·1328 定价：0.47元

出版说明

这是一部以本世纪二十年代意大利南方的一个小小农村——芳丹玛拉为背景的小说，内容是描写法西斯蒂的始作俑者墨索里尼当权后农民所受的剥削和凌辱。小说深刻揭露了法西斯蒂的后台老板——垄断资本家的蛮横、虚伪与无耻，勾画了一批为垄断资本家效力的绅士先生们的丑恶嘴脸，热情歌颂了农民们的反抗和斗争。文笔既含讽刺，又富幽默，是一部别具风格的作品。

作者I·西龙尼（1900——1978）是一位在西方具有广泛影响的作家和政治家。一九二一年参加意大利共产党，是意共创始人之一。一九二六年墨索里尼上台后，他与意共领导人葛兰西被迫转入地下活动，曾多次受意共委托，到国外执行秘密使命。一九三〇年，“特别法庭”对他进行缺席审判，他只得流亡瑞士，继续进行反法西斯活动。后来，他因同共产国际发生分歧，宣布退出意大利共产党，开始他的文学创作生涯。其主要长篇小说有《芳丹玛拉》（1933）、《面包和酒》（1936）、《独裁者的学校》（1941）、《雪地下面的种子》（1941）、《一把黑莓》（1952）、《路加的秘密》（1956）、《狐狸和茶花》（1961）等。从一九五二年到一九六八年，他主编政治——文艺刊物《现代》，主持“意大利文化自由协会”的工作。一九七八年逝世。他的死在意大利引起巨大的震动。意大

利总统佩尔蒂尼在唁电中还说，西龙尼是“一位为争取自由、民主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杰出人物，现代意大利文化的卓越的享有名望的代表”。

《芳丹玛拉》的中文译本在我国还是第一次出版。

湖南人民出版社译文编辑室

一九八〇年八月

序

我要讲的故事是去年夏天在芳丹玛拉发生的。

你可以猜想，芳丹玛拉是马西卡地方最贫穷、最落后的村庄。它座落在干涸的富奇诺湖床的南面，紧靠插在嶙峋山脊上的那所残破的教堂。大约有百来户平房，奇形怪状，参差不齐，因年深月久而发出黑黝黝的颜色。再加风吹雨打，都壁破梁歪了。平房的屋顶全盖得不成个样子，用的是瓦片和各式各样的废料。这些蹩脚房子，多数是洞开一面，既当门窗，又当烟道。屋内没铺地板，四面砌的清水墙。男人、女人和他们的孩子、驴子、山羊、猪和鸡，都挤在草席上一起生活、睡觉、吃喝、繁殖。

如果不讲这故事，关于芳丹玛拉就没有比上面再多的情况可以介绍了。我这辈子的头二十年虽然一直住在芳丹玛拉附近，但要谈论这村庄，也不外乎这些情况。

二十年来，同样的天，同样的地，同样的雨，同样的雪，同样的房屋，同样的节期，同样的饮食，同样的贫困：贫困是从父辈传下的，而父辈又继承自祖辈，祖辈又从曾祖辈将它接收过来。人的生活，牲畜的生活，大地的生活，总是好象被关闭在一个静止不动的圈子里，与时间的推移远不相干。封闭在它那个天生如此的圈子里。

首先是播种，接着是除草，随后是修枝剪叶，然后是熏硫

磺烟，再后是刈割，最后是收获。后来怎样呢？

后来，再重复一遍。

播种，除草，修枝剪叶，熏硫磺烟，刈割，收获。

总是做这同样的事儿，一成不变，永远如此。一年年过去了，陈年旧月累积了起来，年轻的变老了，年老的死去了。他们播种，除草，修枝剪叶，熏硫磺烟，刈割，收获。后来又干什么呢？

同样的事儿。这以后呢？还是同样的事儿。每个年头和上个年头一样；每个季节和上一年的同一季节相似。

在天气恶劣的月分里，他们安顿家务，就是说他们为家务而吵嘴。在芳丹玛拉，没有哪两户不是沾亲带故的。小村庄嘛，总是家家户户带点亲戚关系。就为了这个原因，这一家和那一家没有不互相争吵的。老是同样的口角，无休止的口角。一代一代传下去，打不完的官司花不尽的钱，全是为的判定谁家拥有某个荆棘丛儿或者什么的。树丛也许烧掉了，但他们还会一直争吵下去。

要突破这状况，简直毫无办法。他们可能每月积下二十个索尔多^①，积下三十个索尔多，到夏季甚至每月积到一百个索尔多，这样也许一年储蓄三十个里拉^②之多。可是，后来生起什么病，或出了什么事故，十年的积蓄会花个精光。于是再从头来：每月二十个索尔多，三十个索尔多，一百个索尔多。过后，又是从头再来。

在下面的平原上，许多情况在发生变化，而芳丹玛拉却不改旧观。土地是硗薄的，干燥而多石。歉收的田地，典了又

^①意大利铜币，一个索尔多等于二十分之一里拉。

^②意大利货币单位。

典，押了又押。没有哪一户农民所占的土地超过几平方码。

大约八十年前，富奇诺湖里的水被吸干，造成马西卡地区的温度处处升高，连周围丘陵上古老的耕作栽培都遭到破坏。橄榄园全给毁了。葡萄生了病害，再也达不到全熟。到十月底下第一场大雪之前，才好去采摘。酿出的是一种酸酒，味道象柠檬汁那样苦。这种酒如果还有人喝的话，多半是酿酒的农民。

这些损失，是利用富奇诺湖干涸了的土地所补偿不了的，尽管那片土地在意大利也数得上是顶肥沃的了。富奇诺平原实际上一直给套上了殖民制度。每年出产的丰饶物品并不是留在当地人手里，而是进入大都会了。富奇诺的一万四千公顷土地，连同罗马和托斯康的广大农村地区，都归自封的托尔洛尼亚亲王所有。他出生奥韦尼亚家系，祖上是上世纪初随着一个法兰西军团定居在罗马的某个托尔洛尼厄。此人投了战争的机，又投了和平的机。他做过食盐的投机买卖。在一八四八年的战争和随之而来的和平中他投过机，在一八五九年的战争和随之而来的和平中他也投过机。他投过波旁皇室的机，又投过波旁皇室衰微的机。一八六〇年以后，他设法用低价垄断了那不勒斯—法兰西—西班牙公司的股票。这个公司为吸干富奇诺湖水铺设过地下排水道。根据那不勒斯国王授与该公司的权利，托尔洛尼厄本可取得开垦地的为期九十年的收益。他以给予皮埃蒙特王朝政治上的支持，换得开垦地的永久使用权，并且被封为公爵，其后又获亲王称号。皮埃蒙特王朝赠送给他的东西，原来就不是他们本身所有的。

自封的亲王托尔洛尼亚如今豢养着一支武装卫队，保护他那神圣财产。约莫三十七英里长的沟渠环绕着他那广阔领地，进出全是通过沟渠上架设的若干吊桥，天一黑桥就吊起。在那

片平原上，谁都没权盖所房子或搭个茅棚。

大约一万名农民耕种富奇诺土地。自封的托尔洛尼亚亲王把土地租给邻近的律师、医生、公证人、教师和富农。他们不是转租，就是自家经营，按日雇用最穷困的农民。在富奇诺盆地沿岸已经形成的市集上，都有一个农工市场，交易——这在意大利南部的大多数镇区里是常见的。大地主们可以到市场上按日雇用农业工人。农工们要到富奇诺干活，每天得步行三至九英里^①。

和农民们的贫困对比，极为鲜明的是托尔洛尼亚每年从富奇诺取得的巨额财富：八千万公斤甜菜，三千万公斤小麦，一百万公斤的各种蔬菜。

富奇诺的甜菜，是供应欧洲顶重要的一家糖厂的主要原料。但对种植甜菜的农民来说，糖这种甜味的佳品，只有复活节吃甜食的时刻才从他们家里见到。富奇诺的小麦几乎全都运入城市了。城里人用小麦做白面包，做面条和饼干，还用来喂猫喂狗。可是种小麦的农民，却被迫在全年的一大半时间内去吃玉米。这样看来，农民们从富奇诺所得到的确确实实只是一种饥馑生活了。

有一个时期，农民至少可以向美洲移民。战前就连芳丹玛拉的男人们也经常到阿根廷或巴西去碰碰运气。他们当中，有些人发了财，并不回到芳丹玛拉，却在附近镇区安家落户，因为在那儿有某种机会可以利用他们的积蓄。没有发财的人，还回到芳丹玛拉，陷入一般动物的浑浑噩噩状态，追怀着他们在大洋彼岸的一幕幕生活情景，如同梦想失去了的天堂。

可是在去年短短几个星期内，发生了一系列事件，使多少世

① 1英里约等于3.22华里。

代以来一直静如止水的芳丹玛拉的生活兴起了波涛。出了什么事，新闻界并未忙于赶去采访。只是在几个月之后，才在意大利国内外开始透露出一些传闻。

芳丹玛拉，一座地图上找不到的村庄，一夜之间成为人们纷纷议论的对象了。有些人认为，这个村庄逼真地代表着意大利的大部分地区，即意大利南部地区的情况。

我出生在芳丹玛拉的邻近地区，而且在那儿住过二十年。几年阔别，并不妨碍我认为那些和芳丹玛拉有关的事件是虚构的，压根儿就没发生过，而是出于暧昧不明的种种原因，凭空捏造的，是编出来对这偏远的村庄发泄宿恨，好给居民们更加沉重的打击。我试图打听出直接的消息，每次都告失败。

在我已将它置之脑后的时刻，却发生了一桩预料不到的事。我夜里回家，看到三个农民，两男一女，挨着我的门卷缩在一起，差不多是睡熟了。瞧他们的兜帽和麻制背包，我一眼就认出他们是芳丹玛拉人。我进门时他们站了起来。在煤气灯光下，从他们脸上我也认出来了。他们确实是芳丹玛拉人。

那个老人又高又瘦，举止笨拙，行动象狗熊那样缓慢，朴实的脸，花白的头发。站在他身后，被他的影子遮住的，是他的老婆和儿子。他们走进门。他们坐下。他们开口讲话。（这时，从他们口音上我也听出来了。）

老人先开了口。接着他老伴叙述。过后又是老人讲，又是他老伴接着叙述。老人再讲一阵，他儿子开口了。最后是老人收尾。

老人谈完，东方已经发白。

他们讲的话都记在这本书里。

现在要说明两点。这个故事和文学作品中经常呈现的南部

意大利风景如画的图景相比，看来会有截然不同的不同。大家都知道，在书本上南部意大利是块清静而非常可爱的国土。那里的农民，男的去干活时唱着快乐的歌儿，少女们按照最优雅的传统习惯扬声作和，同时夜莺在附近的树林里婉转和鸣。

这样的事儿，在芳丹玛拉可惜从来没有发生过。

想在这个故事里寻求民俗学的人也会感到失望。他们将找不到一句话是谈的芳丹玛拉的风俗习惯。也找不到一句话是方言土语。芳丹玛拉附近没有森林，山冈和阿平宁山脉的大部分地段一样，干燥而荒凉。鸟儿不多，没有夜莺。在当地话里连“夜莺”这个词儿都找不到。农民们聚在一起也好，独自待着也好，都不唱歌，就是喝醉了酒也不唱歌。不足为奇，他们去干活也很少出声歌唱。他们用咒骂来代替歌唱。要表达任何强烈的感情——欢乐或愤怒——他们就开口咒骂。就是在咒骂方面，他们的想象力也并不丰富。举例来说，和佛罗伦萨人根本不好比。芳丹玛拉人挑中两三个他们熟悉的圣徒来咒骂，咒骂的方法总是千篇一律。

记得在我年青时，鞋匠倒是芳丹玛拉唯一的唱唱歌儿的人。他老是唱那么一支歌子，那是阿比西尼亚^①战争初期流行起来的。歌词是：

啊，巴尔迪塞拉，

你别信任那些黑种人。

这种警告，芳丹玛拉人一年到头、从早到晚都听得到。鞋匠一年年老起来，歌声也变得越来越阴郁。村里的年轻人听了，开始受到极度恐惧思想的折磨。他们生怕巴尔迪塞拉将军会因一时鲁莽，神不守舍，粗心大意，真的信任那些黑种人，

^①即现在的埃塞俄比亚。

从而断送了性命。很久以后，我们才晓得，这个悲剧在我们出生前早就发生过了。

（以上是说的第一点。）

第二点是：我用什么语言来讲这个故事呢？

谁都不要存这样的想法，以为芳丹玛拉人讲的是意大利语。意大利语是给我们在学校里学习的语言，象拉丁语、法语或世界语一样。对我们来说，意大利语是一种外国语，是一种死语言。这种语言的词汇和语法已经复杂化，不再和我们有所联系，它和我们的生活方式、行动方式、思想方式或自我表达方式都毫不相干了。

当然，除我本人，南方的其他农民也曾经说过和写过意大利语，正象我们进城时擦亮皮靴，佩上领子，打起领结一样。可是，你不得不瞅着我们，瞧我们那种不很自然的局促相。用任何语言都能很好地表达思想。如果这种说法是确实的话，你必须首先学会用那种语言来思想。那末在清楚地讲说意大利语方面我们存在着困难，这准是意味着我们不懂得怎样运用意大利语来思想（意味着意大利文化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外国文化）。

我们尽管可以借用意大利语，但是讲故事的方式还是我们自家的。这是芳丹玛拉的一种艺术，是我们童年时代，整夜整夜地睁眼躺在织布机旁，模仿织布机的韵律学得来的。

这种叙述方式，这种逐词逐句，逐行逐段的组织方式，和古老的纺织艺术，即一丝一线，一彩一色，整齐细密，朴素坚实地纺织下去的艺术进行比较，两者并无区别。首先见到玫瑰花梗，然后是玫瑰叶，再后是玫瑰花萼，最后是玫瑰花冠。不过从头到尾，人人都知道，绣的是一朵玫瑰。所以在城里人看来，我们做的东西好象是既天真幼稚，又少琢磨。但是这些东

西，我们何曾想找城里人来购买？我们几时拿进城去推销？同样，我们要求过城里人用我们的方式来叙述他们的情况吗？我们从没这样要求过。

因此，让每个人用自己的方式去谈他自己的事吧。

伊尼亚齐奥·西龙尼

第 一 章

去年六月一号，芳丹玛拉第一次没有灯光。六月二号，六月三号，六月四号，芳丹玛拉连续没有电灯。这样，接连好多天，接连好几个月，一直到芳丹玛拉人习惯了利用月光。

芳丹玛拉从利用月光到使用电灯光，花了大约一百年时间。在这段过程中，点的是橄榄油和煤油。现在，一夜工夫，又从电灯光回到月光啦。

小辈们不知道历史，老一辈子人都很清楚。

皮埃蒙特王朝统治的七十年间带给我们南方农民的新事物，归结起来有两样：电灯和香烟。

电灯为我们接受了。香烟呢？你头一次抽它会呛得要命。给我们抽抽纯烟丝一向是心满意足的。

电灯头次不亮，本应不足为怪。然而这却成为奇事。

在芳丹玛拉，电灯已经变为一种自然现象。这就是说，谁都不付电费。好多月份，没哪个付过一个子儿。最近，收款人再也不来递送那个一月之内唯一的通知付款的东西——我们用来擦烟斗的一张纸条儿。上次收款人来时，差点儿不能安然无恙地离开。在通向田野的大路上，一枪几乎打中了他。

他是非常小心谨慎的。他来芳丹玛拉，总是趁男人们外出干活，只有妇女和小孩留在家里的時候。一个人越是小心谨慎越

好嘛。他非常客气。散发通知单时微带傻笑，流露出深厚的同情。他说：

“拿去吧，又不会咬你的手——嘿，家里备有一张纸总要方便点吧。”

一个人越是客气越好嘛。后来，一个卡车司机向他做了解释。不是在芳丹玛拉（他再也不到芳丹玛拉抛头露面了），而是在山下面的市镇里——一个卡车司机向他解释说，那一枪也许不是对准他的。就是说，不是反对他个人，不是反对法警因诺切恩佐，而是反对捐税。但是如果子弹击中目标，打死的不会是捐税，只能是他，而谁都不会为此掉一滴眼泪。这样一来，他就再也不能抛头露面了。他灵机一动，想出个主意，要求镇区当局对芳丹玛拉人提出民事诉讼。

“假如你能捉住他们的跳蚤拿去出卖的话，民事诉讼无疑会有很大效力。”他有一次说道，“可是，因为法律在这方面不起作用，没法子，只好停电。”

电灯本是安排在一月一号断电的。后来改为三月一号，改为五月一号，又改为六月一号。六月一号，电灯断电了。

待在家里的妇女和孩子是最后才注意到的。但是，我们干完活回家的人，那些骑驴出门从车马大道回家的人，那些取道墓地从山上回家的人，那些挖掘沙洞沿着小河回家的人，那些整天在外面或多或少从四面八方回家的人——在天渐渐黑下来的时候，看见周遭的其他地方电灯都亮起来了，但芳丹玛拉仍是一片黑暗，失去了它的光彩，掩盖了它的面貌，变得模模糊糊，与树木、篱笆和肥堆合成一片——我们这才恍然大悟，知道了是怎么回事。（这使我们吃了一惊。再一想，也不以为怪。）

对孩子们来说，这等于是开了一个很大的玩笑。孩子们喜欢作乐的机会并不多，一旦抓到了机会，他们是懂得怎样去享受一下的。如看摩托车达达驶过，两条毛驴套上一辆大车，或烟囱失火等这些事儿。

我们到达庄稼地时，碰到了巴尔迪塞拉将军。夏天，他经常在自己屋子前面，就着街灯光给鞋底打掌子，工作到深更半夜。一群人围着他的工作台，把他的凿子、钉子、刀子、皮革、麻线和切下的鞋后跟搞混在一起，还把一桶脏水泼翻在他的脚上。现在他扯高了嗓音，向街坊上虔诚慈善的人们呼吁，他问我们干活回来的人，他这么大年纪了，两眼昏花，应该不应该夺去他的街灯光，对这种蛮横行径，乌姆贝尔托国王心里会怎么想。

乌姆贝尔托国王心里会怎么想，这就很难猜测了。

妇女们怨天恨地，这是挺自然的事。妇女们——没必要举出她们的名字——坐在家门前的地面上，一边做饭、喂奶，一边唉声叹气，好象死了什么人似的。她们抱怨电灯断电，似乎她们的悲惨命运在那片黑暗里会变得更加惨淡。

在玛丽埃塔·索尔卡内拉的酒店前，我和米凯莱·佐姆帕走近摆在街上的那张桌子便停了下来。紧跟着来的是贾科贝·洛苏尔多，牵着条出门骑的毛驴。接着到的是背着硫磺喷气筒的蓬齐奥·皮拉托。再后面是出去修枝剪叶的安东尼奥·拉诺恰和巴尔多温诺·夏拉帕。最后面是贾钦托·巴尔莱塔、韦内尔迪·桑托、奇罗·齐龙达、帕帕西斯托和其他挖沙洞的人。我们在一起谈论电灯，谈论捐税。新的税，旧的税，镇区的税，联邦的税，同样的话题儿重复了一遍又一遍，因为这些情况是一成不变的。我们没注意，一个陌生人走来了。

一个陌生人骑着自行车。在那时候，很难看出他是什么样的人。

不是收电灯费的人。不是镇区派来的那个家伙。也不是治安官署里的人。他外表象个上流社会的青年，生有一张柔滑的脸蛋，胡髭刮得光光的，小嘴巴红红的，活象母鸡的屁股。

他用一只手抓住把手，提起自行车。那只手不大，象蜥蜴肚皮那样滑溜。鞋子上覆着白色的鞋罩。

我们都不讲话了。很清楚，这个骗子是来送新的税收通知单的。这点毫无疑问。但也毫无疑问他这次是白跑一趟，他的通知单会遭到和法警因诺切恩佐的通知单相同的命运。要弄清楚的问题是另外一件事：现在还剩下了什么可以抽新税？我们每个人都在心里盘算着。但谁也琢磨不出。

我们琢磨的时候，那陌生人用颤抖的轻声问了两三次，谁能给他指点一下“英勇的索尔卡内拉的寡妻的住宅”。

玛丽埃塔·索尔卡内拉就在场。她站在酒店门口，怀孕的大肚子把门给堵塞了。打从她丈夫阵亡后，这是她第三次或第四次怀孕。除了抚恤金，她丈夫还给她留下一枚银质奖章。可是并没留给她三个或四个胎儿。靠她丈夫的光荣（人们是喜欢这么讲的），索尔卡内拉在战后的岁月里经常和有地位的人们来往。有一次，在城里举行的庄严隆重的爱国仪式上，她给安进主席团，坐在主教身旁。她当时正第二次怀孕。她怀了孕，肚子总是大得讨厌。主教眼睛不瞎，对她说：

“太太无疑已经再嫁了吧？”

没有，她回答。据说主教吃了一惊，用某种方式提到她的怀孕。玛丽埃塔冷不提防，一时想不出别的话搪塞，只好说：

“这是已故的勇士留下的纪念品”。